

郑观应国防思想初探

谭锐

(西华师范大学 经济系,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 19世纪以来,列强入侵中国日益严重,而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都处于劣势。为拯救民族危亡,郑观应从诸方面提出了改革设想,加强国防即其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加强国防的构想不仅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也为清末的军事改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郑观应; 国防思想; 内容;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61 E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13(2004)03-0061-04

郑观应(1842—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杞忧生,别号倚鹤山人,或罗浮倚鹤山人。广东香山雍陌乡(今中山三乡镇雍陌乡)人。郑观应是著名的爱国者,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全面维新思想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郑一生最强烈愿望就是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地”,因此,“攘外自强”也就成了郑救国思想的主题。郑观应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了改革设想,国防思想便是其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

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必须有强大的海、陆军作保障,因而建立新式海军、陆军以及加强军队建设便成为郑观应国防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

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将战略重点由“陆防”转向“海防”,故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南北洋海军相继建立。当时用较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北洋舰队在硬件方面虽居于亚洲领先地位,但封建官场的腐朽习气却弥漫海军上下,“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盖海军之废弛久矣”^[1]。尽管《北洋海军章程》专设有《军规》一章,明确制定了对违纪者的惩治办法,却近乎一纸空文,以致出现了“不肖者,碍情不加处治,故众多效尤。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相习成风,视为故态。下属不敢发上司之非,上司亦能隐下属之过。甚至临阵退缩,畏葸不前者,不加查察。而功罪倒

置,物议沸腾”^[2]的腐败局面。对此,郑观应曾忧心忡忡地指出:“如不能自强,不设海军,不制铁甲,虽有名目,似难施行,徒有瞠目视之而已。”^{[3](P883)}同时,这也造成了“中国海疆袤延万余里,泰西各国兵船飚驰轮转,络绎往来,无事则探测我险易,有事则窥伺我藩篱,从此海防遂开千古未有之变局”的局势。因此,郑氏向清廷发出了“居今日而筹水师,诚急务矣”^{[3](P873)}的强烈呼吁。

海军腐败如此,陆军亦然。昔日强悍的八旗兵、绿营军多年养尊处优加之太平天国的打击早已元气大伤,“其人籍者多老弱无赖之辈,鲜精强克敌之夫。升平日久,旧额虚悬。余兵顶冒,营务废弛,至斯而极”^{[3](P856)}。中日启衅以来,各种名目的军营林立,计有二三百营之多,“兵力不为不厚,无如人各一心,营各一名,政出多门,不相统属。每当遇敌,其怯敌偷生者非溃即逃,否则各守一方、不相策应,但得敌不来攻,即自幸偷安旦夕,纵观别军败衄,亦恒如痛痒无关。甚者逍遥局外,调遣不前。合之虽二、三百营之有余,分之实二、三十营之不足,以致兵威日蹙,敌焰弥张”^{[3](P869)}。

面对这样毫无战斗力的海、陆军,郑观应清楚地意识到,现有的清军根本无法担当同列强作战的重任,必须建立起一支近代化的国防军。他认为:“内安外攘莫先于兵,整旅行师莫重于练。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3](P853)}因此,重建海、陆军最紧要的为练兵。而“练兵之法,先练其心,次练其身,再练其气。练心者何?教之以尊君、亲上、忠国、为民是也。练身者何?教之以步伐、进

收稿日期: 2004-03-22

作者简介: 谭锐(1972—),女,重庆丰都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史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研究。

退、手足、耳目一切技艺之类是也。心一矣，身便利矣，而无胆气以将之，则一作仍衰，一衰斯走耳。故惟练气为尤要”^{[3](P862)}。这表明郑观应已看清了中国军队腐败的根源所在。所以他除了从心、技、胆三个方面对部队的训练提出改革之外，还提出应针对士兵的专长将其分类，“如陆营选北人充之，则骑射是其所长；水军择南人充之，则行船是其所习。然后汰其怯弱，选其精强。”“将额设水、陆营兵，严加挑选，分为三等：其惯于驾驶能辩风云沙线者为一等。精于韬略能识山川形势者为一等。膂力过人工于枪炮击刺者为一等。不能入此三等者，悉行淘汰，就地另募壮丁补充”^{[3](P136)}。这样，各兵种各司其职，在战斗中分工合作，势必极大地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

仅有高素质的士兵，若缺乏优秀的将帅，军队最终也只会是一盘散沙。当时的清军将帅位尊爵崇，“平日优于自奉，性耽安逸，不能与士卒同甘苦；无事之时只知酒色怡情、赌博逞志，及其临事又复贪财惜命，如是人谁肯为之用哉？”^{[3](P841)}故郑观应指出，“全军之性命系于将帅，将帅之存亡关于国家，练兵必先自练将帅”^{[3](P841)}，把对将领的训练作为基础和重点。他认为新式将领“必先洞悉山川形势，由何处进剿，何处安营，何处设伏，何处可断其粮道，何处可绝其援师，地势敌情，了如指掌。绘图录示，使营中上下无不周知”^{[3](P136)}。具体而言，陆军统帅须“熟识《武经七书》、中外兵法、测算、天文、地理、图说，及古今战阵胜负根源”，海军将领则“一切舟楫、橦帆、测风、防颶、量星、探石、枪炮命中，凡行船布阵一切诸大端，必须悉如泰西水师事事精能”^{[3](P842)}。

郑观应从自强御侮的目的出发，从整军强兵角度提出了建立近代化军队的改革方案。其练兵思想既有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亦含西方练兵之法，融汇了中西方较先进的军事成果。不仅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也为清末新政的军事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边疆危机的爆发，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海防与边防之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主张放弃边防，专顾海防。“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俞棘。”^[4]而以王文韶为代表的“边防论”，则主张暂缓海防。“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

不致构衅于东南。”^[5]与上述两种观点相反，郑观应认为，如无海防则“重门洞开，内皆酣睡”，只能加重列强的侵略野心；而边防却如人之手足、皮毛，护理不周则“四肢不保，一举一动，皆蹈危机”^{[3](P773)}。因而，海防与边防应该并重。为此，郑观应作出了详细的海防、边防部署设想，这些设想反映了他“以守为战”的总体战略，是其国防思想的另一主要内容。

中国海域广阔，海岸线绵延万余里，海防尤为重要。由于清统治者的腐朽，武备松弛，海防形同虚设，使国家在鸦片战争后近半个世纪受尽列强欺凌。郑观应对此颇有感受，“迩来洋人麇至，交涉纠缠，稍有违言，动开边畔。……中国海疆辽阔，防不胜防，更宜握要以图，自强不息。……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3](P128)}。可见，郑观应已将海防提升到国防战略的重要地位。同时，他还针对中国九省临海、港口众多、设防难以周全的特点，规划了一套周详的海防方略：“定沿边海势为北、中、南三洋。北洋起东三省，包牛庄、旅顺、大沽、烟台，就中宜以旅顺、威海为重镇，势如环，供卫京畿，则元首安也。中洋起海州，包崇明、吴淞、乍浦、定海、玉环、马江，就中宜以崇明、舟山为重镇，策应吴淞、马江各要口，则腹心固也。南洋起厦门，包汕头、台湾、潮阳、甲子门、四澳、虎门、老万山、七洲洋，直抵雷、琼，就中宜以南澳、台湾、琼州为重镇，而控扼南服，则肢体舒也。”^{[3](P755)}这样，“一旦海上有警，则调南洋各海船以扼新加坡及苏门答腊之海峡，迎击于海中；次调中洋、台湾、南澳之舟师，为接应、包抄之举；再次则调北洋坚舰，除留守大沽口及旅、威二口外，余船亦可徐进中洋，弥缝其阙，坐镇而遥为声援。”^{[3](P756)}北、中、南三洋相辅相成、环环相扣的配合，使南、北皆能相互呼应，从而使我国的海防固若金汤。

至于边防，郑观应清楚地看到：“中国自开海禁，尽撤藩篱。法国侵占越南，与云南之蒙自、开化，广西之镇安、左江，处处毗连。英国据五印度，由暹罗、缅甸以入镇，由前藏旁连青海以入蜀、入陇。俄国则跨有三洲之境，其南鄙包络黑龙江、蒙古、新疆以至西藏，袤延三万里，皆与中国接壤。此外海国番舶出没于东南七省，自奉天金州、复州以达广东之琼崖，沿海设防亦一万四千余里。前朝边患急于陆者缓于水，急于水者缓于陆。今则水陆交迫，防不胜防。”^{[3](P468)}故而他发出

“中国之防务，防海既难从缓，边防更为要图”^{[3](P774)}的呼声。

郑观应还认为边防的重点是防俄。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就意识到沙俄的扩张野心。他说：“查立约诸国，最强者莫如英，而美、法与俄皆堪颉颃。然英人险诈，法人鸷猛，势力相敌，迹其离合，实系安危。俄则地据形胜，兵严纪律，惟以开疆拓土为心，向为诸国所忌，而尤为中华之所患。宜外与联和，内严防守，不可或忽也。”^{[3](P1140)}到了80年代，郑观应对沙俄侵略本质的认识更为深透：“俄人鲸吞蚕食，战兵数万，距吉林才隔一山；战船泊于东洋，互为声援者又数十号。近复与日本同谋，结约吞并朝鲜，逼处凭陵，有日辟百里之势。”^{[3](P469)}。据此，郑观应得出了“防俄宜先”的结论。但他并不认为防御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足轻重，而是明确指出：“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古之御戎不过数国，今则文书车轨遍及五洲矣。……是以防边之道虽以防俄为急，而英、法亦不可不防。”^{[3](P785)}除俄国外，对日本的侵略意图，郑观应亦有清醒的认识：“年来日本讲究水师，频添战舰，多置军械，及遣人分住各口，设贸易馆，习方言，托名学贾实则交结匪人，时入内地暗察形势，绘图贴说，其志叵测，恐终为中国边患。”^{[3](P760)}而郑观应最担心的则是各国联手对付中国，他说：“倘俄、法合力侵犯，水陆并进，南北夹攻，恐西人之大欲将不在赔费，而在得地矣！俄、法有事，英、德、美、日必以屯兵保护商人、教士为名，亦分占通商各口，后患之来不堪设想！”^{[3](P760)}

面对列强环伺，边防危机重重的严重局势，郑观应首先提出了缓解危机的三条措施：“广造水雷，多制铁舰，训练水师，以资战守；划清疆界，载诸和约，以免侵占；遣使属国，代为整顿，以资镇抚。”^{[3](P115)}其次提出了实施联英、德、美以拒俄、日的连横政策。最后提出了巩固边防的五条建设性意见，即“添练防兵以联声势；建筑炮台以扼要冲；赶造铁路以便营运；增设电线以灵消息。而尤要者在乎多筑土垒。”^{[3](P775)}

在郑观应的心目中，只有建立起铜墙铁壁似的海防和边防，才能维系国家的主权与发展。他的海防、边防部署设想，适应了形势的要求，把御外侮放到了首要地位，体现了其“御外侮更重于防内患”^{[3](P903)}的中心思想。

三

郑观应的国防思想着重于防御，但有效的防御在于强兵，强兵又重在“人”、“器”两个要素：“从来讲备边者，必先利器，而既有利器，则必有用此利器之人。器者，末也；人者，本也。”^{[3](P763)}他认为强兵最重要的，一是军队的指挥管理、兵员素质；二是兵器设备及各种物质设施。郑观应也正是从这两方面为实现其改革方案提出了相应措施，使之成为其国防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一，改革武科考试之法，设立武备学堂，以培养专门军事人才。郑观应对人才十分重视，认为“用兵之要首在得人”^{[3](P130)}。但当时的习武之人多注重骑射等传统技艺，而少有学习军事理论与实战技巧的。所以郑观应指出应变革武科考试之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境况。他说：“今战守之事，藉以出奇制胜者不外乎水师、火器，似宜于武科中列三等以考试之。一试能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深知地理险阻设伏应敌者。二试能施火器，命中及远，驾驶战舶深知水道者。三试制造机器，建筑营垒炮台，善造战守攻诸具者。”^{[3](P293-294)}后又进一步提出将武学分为两科：“一曰陆军科，凡枪炮利器、兵律营制、山川险要及陆战攻守各法皆属焉。一曰海军科，凡测量、测星、风涛、气候、海道、沙礁、驾驶及海战攻守各法皆属焉。”^{[3](P3000)}如使“一科有一科之用，一人有一人之能”，则“以之制物则物精，以之制器则器利，以之治国则国富，以之治兵则兵强”^{[3](P301)}。武备学堂是西方国家用于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专门学校，主要学习算术、兵志、地利、谋攻、兵律、外语等专业知识。郑观应认为中国也应仿效于此，使从考试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员能得到更全面、更系统的学习。如此，“他日为将领、为偏裨、为教习、为司机、为头目，即在其中，最下亦可为精卒、为匠手、为听受约束之兵丁壮役”^{[3](P879)}。

第二，开艺学，精制造，改进武器装备，增强战斗力。武器装备，指战斗中必不可少的枪、炮、子弹、炮弹等。郑观应寻绎中法之战及甲午海战中国败因，武器装备落后是重要因素之一。于是他向西方各国所使用及新制造武器之性能、特征、优点、使用方法等作了详细说明，希望给我国选择适用武器以参考。但他亦认为：“中国只知采买新式枪、炮，依法制造，不能自出心裁。”^{[3](P907)}也就

是说,中国不能自行制造出适合自身特点的武器。若国家讲求武备,所用器械无法自给,“一一仰给于人,他日有事之时,局外执法以相窘,或受敌之贿,绝我来源,制则无工,售则无路,其将何以御敌乎?”^{[3](P9130)}当务之急在于“宜亟兴艺学,并悬不次之赏,求绝技之人,庶几有恃无恐”^{[3](P915)}。艺学广开,就不愁器物日备、制造日精。这也是“取威定霸之真机,而国富民强之左券也”^{[3](P723)}。

第三,设电报,兴铁路,提高作战效率。有了优秀的军队和优良的装备,缺少外在的辅助条件,也势必影响部队行动的效率。郑观应以普法战争为例,指出:“用之兵间,尤足以先事预防,出奇制胜。所谓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者,非电报不足以当之矣。”电报于清军亦为重要,“近日番舶畅行,华、洋杂处,兵机万变,瞬息不同,一旦有事疆场,飞章入告,庙算遥颁,动稽时日,而彼以电线指挥如意,如桴应鼓,如响应声,一迟一速之间,即胜负所由决矣”^{[3](P665)}。除电报外,铁路也是重要的辅助设施。“铁路之制,而独至军旅之事关系尤非浅鲜。凡有铁路之处,一有兵端,非特邮传信息不虑稽迟,即意外警报,仓卒征调,克期立至,使敌营侦探者几疑飞将军之从天而降也。……若无铁路者,一旦敌人压境,非但兵粮不易调集,即部署有方,亦仓皇莫济矣。”^{[3](P656)}。故若有电报用于信息的传递,铁路用于军队的运输,则清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效率必将获得极大的提高。

四

国防思想作为郑观应改革思想的一部分,与其改革的核心——商战是密不可分的。所谓商战,就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与外国资本主义在市场上进行斗争,以维护自身的利权。这就需要发展近代工商业,郑观应认为:近代工商业发展了,不仅国家致富,军队能有自造的新式装备,更能在市场上与外国的廉价商品相竞争。要达到真正的富强,就必须在经济上战胜帝国主义。他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车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饜欲,孰得而谁

何之哉!”^{[3](P5860)}因而郑观应将“商战”视为实现其“攘外自强”救国谋略的基点。

虽然郑观应十分强调商战的重要,但同时亦不否认国防建设的必要,如前面所提到的开艺学、设电报及兴铁路等实质上就折射出商战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此外,郑观应还多次提出:“今夫保民之道,莫先于强兵;强兵之道,莫先于富国。”^{[3](P282)}“言富国者必继以强兵,则练兵、铸械、添船、增垒无一非耗费巨款……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3](P597)}“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3](P595)}由以上论断不难看出:郑观应将国防建设和商战作为国家自强的治标治本之法。商战为国防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国防建设难以实施;没有强大的国防,商战亦不能获得施行的外部环境。可见,国防建设同商战是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让中国走向富强的基本条件。

郑观应的国防思想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他之所以提出加强国防建设,其目的在于:“不亟讲求兵备,力图自强,即欲求为贫弱而不可得,又安望能洗丧师之耻,复失地之仇哉。”^{[3](P763)}但他却从不孤立地谈国防建设,而是把国防建设同社会政治、教育制度和发展经济等因素联系起来,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时救国方策,为近代中国的强兵富国理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丁汝昌海战记 [A].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列强侵略(1编4册) [C]. 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版. 322.
- [2] 张哲呈文 [A].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 [C].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99.
- [3] 夏东元. 郑观应集(上) [C].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4] 吴汝纶.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C]. 光绪金陵刻本,1905. 19.
- [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 [M]. 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1930. 61.

[下转第87页]

得的，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规律，表明人类已经不仅仅把牛当作一种普通生物，而是把它当人一样看待，赋予它更多的“人性”。

这种根据民族的认识，对事物属性进行某种文化意义上的解说，在《说文》中比比皆是。就动物而言，不光对牛、马的解释是这样，对羊、鸡、鸟等动物的解释也是如此，如：“羊，祥也”；“鸡，知时兽也”；“鸟，孝鸟也”。不仅在《说文》中是这样，在别的释义书中也是如此。如据黄金贵先生对《尔雅》、《说雅》、《郑雅》、《楚辞通故》4书的考察，其文化词语与通义词语之比竟是2:1。

因此，从《说文》全书体例、语言学基本常识、词语的文化说解三方面分析，可以认为，“牛”

字说解当以段氏说解较确，而段氏将“理”理解为“文理”则不够正确，“理”释为“顺从”或更可取。同时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在给词语释义和理解词语意义时，可以考虑它的文化义，这在古书中尤为重要，否则，就不可能求得确诂。此仅一己之见，见笑之处必定多多，还望博学之士指正。

注：本文引文引自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王筠《说文释例》（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版）、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版）、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1983年版）、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等。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牛 in *Shuo Wen Jie Zi*

XU Jia - x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 Nanchang Univ. , Nanchang 330047, China)

Abstract: The lat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haracter 牛 contained in *Shuo wen jie zi*, an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vary greatly. By taking into account of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haracter 马 contained in the dictionary, the stylistic rules and layout of the dictionary, the general knowledge about linguistics and semantic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words, Duan's interpretation prove to be relatively accurate. However, Dua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 理 in “牛，事也，理也” as coherence in writing is not appropriate. In the dictionary, 理 should be interpreted culturally as conforming.

Key words: *shuo wen jie zi*; the character 牛 and 理; conforming

[上接第64页]

An Explor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Thinking of Zheng Guanying

TAN Ru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est China Normal Univ. , N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powers into China w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grim, while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at a disadvantage in aspects of politics, economy, diplomacy and military power. In order to save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danger and extinction, Zheng Guanying put forward various reform conceptions, of which strengthening national defense is an important part. His ideas of strengthening national defense not only conformed to the demands of the time, but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ilitary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national defense thinking; content; influence